

清代的木活字(1644—1911)(續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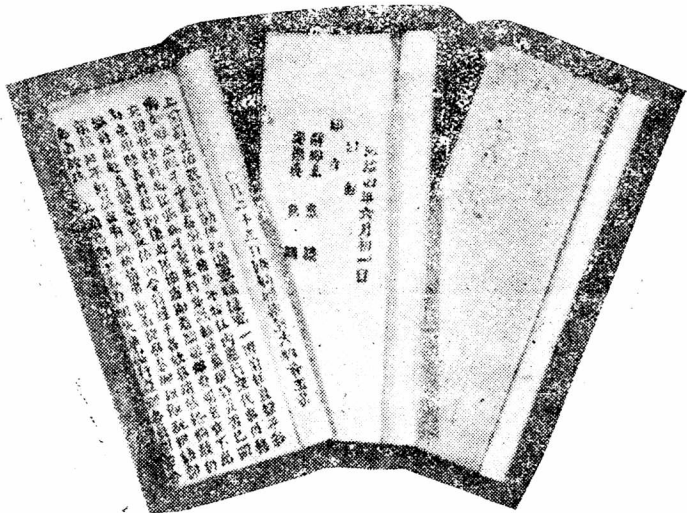
张秀民

(二) 木活字本的内容

清代用木字摆印的图书多种多样,内容丰富。武英殿聚珍板丛书多为宋代解经之作,及宋人别集,亦有《东观汉纪》、两汉、唐、五代《会要》《水经注》《元和郡县志》、《輿地广记》、农书、医方、古算经等,这些书对于研究中国史地及科学史,都很重要,而收在《永乐大典》内,为过去学者所不易见到。难以理解的是当时既然有这样方便的印书工具,号称“稽古右文”好大喜功的乾隆,为什么只印了这一百多种,而不印《四库全书》与《四库全书荟要》呢?实际上抄写七部《全书》和两部《荟要》的费用,比用聚珍板来印,不知更要化费多少。其他公私摆印本有经学、小学诸书。史学方面有正史、传记、年谱、奏议、目录,金石、地理类有府县志约六十种,又有乡土志、山志、游记,而魏源的《海国图志》亦有常州摆木。子部方面有墨子、管子、兵书、医书及农田水利,果木花卉。文学方面历代诗文别集约有二百种,民间文学如谜语、鼓词、弹词、宝卷、戏剧、唱本、亦多有印本,《儒林外史》有同治八年(1869)群玉斋印本,而《红楼梦》既有乾隆程伟元两次活字本,又有光绪二年(1876)聚珍堂本,书名页上写着《绣像红楼梦》,京都隆福寺路南聚珍堂书坊发兑,下有“聚珍堂摆印”朱文方印。其他书籍也有一摆再摆,以至三摆的。类书方面有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北堂书钞》。工具书有《史姓韵编》等。至于丛书也有二十余种,如仁和胡珽《琳琅秘室丛书》,咸丰三年(1853)印,光绪间会稽董氏两次再排印,宜黄黄秩模有《仙屏书屋丛刊》又有《逊敏堂丛书》,而道光十一年(1831)六安晁氏排印的《学海类编》,多至八百七卷,一百二十册,收书四百二十余种,有的据钞本付排,不少是比较希见的。估计清代木活字印本现

在流传者约二千种左右。这对于普及知识,提高文化,是发生过一定的作用,其中有不少书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大参考价值。

清代木活字印本与明代的印本一样,书的本身很少有标明为木字的。光绪乙酉(1885)维扬述古斋校印《汪容甫遗诗集》,有“仿古聚珍木板”字样,这是很少见的例子。清代木字几乎大部是宋体字(明体字),其中又略分长体、方体、扁体三种,字体多呆板,不够美观。即武英殿聚珍板也不及《古今图书集成》铜字的精工。其用楷书体或称“今体字”,仅见于雍正间吴江《甘陈氏家谱》,湖州汪亮采南陔草堂印《唐眉山集》,与后来苏州周氏易安书屋泉州黄氏梅石山房印本,其中湖州汪氏活字最称精良。一般的木字都比较大而醒目,有的家谱中的木字几乎有近一寸见方的,一般的相当现在的头号字。龙氏敷文阁,姚氏集福怀儉斋,龚氏《亦园子板书》的注文小字都比较小,相于三、四号字,因为过小,则写刻都比较困难。同治庚午(1870)印《六美图》弹词,大部分采



图三 《京报》同治四年(一八六五)木活字印本

用簡體字，字體潦草，排印粗心，亦發見倒排之字如“閱”字。清代木字本也有避諱，如姜東施氏印《吳郡文粹》，丘、胤缺筆，楊氏《讀史四集》，禎、弘避諱，《學海類編》也避諱字。宋代有避軒轅黃帝諱的，至清代尊重孔子，避孔子諱，故《吳郡文粹》照避。家譜中間有避諱，似乎並不謹嚴。木字本很少標明售價，乾隆五十八年（1793）周秉鑑易安書屋用朋友送他的六千多個活字，出版《甬里逸詩》，在姓氏后有，“印一百部，五十分送四方，五十待售，紋銀貳錢”，這是半送半賣性質。

清代木字除印書籍外，又印報紙，這是沿襲明崇禎十一年（1638）以後的老法。袁棟說“近日邸報往往用活板配印，以便屢印屢換，乃出于不得已，即有訛謬，可以情恕也。”乾隆初年如此，直至清末仍如此。關於北京的報紙，十九世紀來引起不少外國人的注意，在他們的記載中往往提到用木活字印

的《京報》，所謂 Peking Gazette。鮑爾以為是用白楊木或柳木活字所印。^⑤京報所載無非上諭、奏折、官吏升遷、某官謝恩、某官請假等，只供統治階級內部參考，發行數量不大。其形式是書本式小冊子，薄薄的竹紙每日二三頁，多或六七頁。字體不大，大小不一，行字歪斜，墨色濃淡不均，魚魯亥豕，幾乎每頁均有。外裹黃色薄紙，蓋有朱印木戳“京報”二字，及某某報房字樣。現在所見較早的也只是同治京報（圖三）了。台維思以為北京又有一種《紅皮曆書》，按季出版，所列各處官階相同，有時只換了一兩個人名，故亦用活字印。^⑥所謂紅皮曆書，實際上就是指北京出版的《摺紳錄》。也就是當時中央及地方政府的職員錄，因為書的外皮用紅紙裝訂，故有此稱。此外利用木活字最普遍最頻繁的，莫過於江浙一帶民間印家譜。

（三）木活字與家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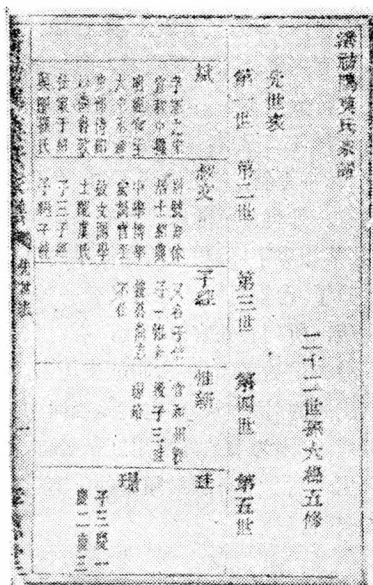
我國古代重視門閥，故譜牒之學甚盛，而隋唐及其以前的譜牒，盡皆亡佚；今傳世最古者只有少數宋元以來的家譜。家譜在清代以各種名稱出現，有宗譜、族譜、家譜、家乘、大宗譜、小宗譜、世譜、瓜瓞譜等名。至於統譜、通譜、合譜、全譜、大同譜、往往合同姓數族為一編，近譜、支譜、房譜、範圍較小、指一房一派而言，最通行者為家譜與宗譜兩名。家譜是封建時代的產物，內容無非是記載一個家族的祖訓，家法族規，祠堂或義莊的規則，世系、圖像、傳記、壽序、贈言，每人的生年卒月、墳墓、塋產、祭儀、祭品或附刊祖先著作與詩文。這些一家一姓的文獻，看來似乎是无用的糟粕；但糟粕之中却保留了不少精華，為研究國內外民族遷徙，人口統計，社會風俗、文學、歷史、及各種科學研究，提供了不少珍貴資料。家譜與方志是我國史學中二大巨流，一是家族史，一是地方史。我們大家已熟知方志的重要價值，而對家譜的利用似乎剛開始。李儼先生據明隆慶刻本《休寧率口程氏續編本宗譜》找到明代算學家程大位的誕生年月。叶國慶先生看了抄本泉州《林李宗譜》知道明大思想家李贄本姓林，名林載贄。其父祖俱信回教，因此他反對傳統的儒教也很自然的，並且他又含有波斯或阿拉伯人的血統。

現在博物館及書籍插圖上宋代科學家沈括像，多根據《清溪沈氏家乘》翻照的。而在《朶山安黃氏家譜》中可看到明代著名出版家安國的画像，及其詩集。這些都是在正史、方志、與他書中所找不到的。如何對家譜去粗存精，含英咀華，化朽腐為神奇，那就在乎運用之妙了。

過去宗法社會重視血統關係，為防止異姓亂宗等流弊，家譜概不許外傳，譜中多有明文規定。又以為“祖宗之靈爽于是乎在”，故雖親友亦不得借閱，而為子孫什襲珍藏，視為傳家之寶。除非子孫不肖，它很少流落到外邊，因此也不易買到。解放前北京圖書館所藏家譜只三四百種，既不及日本各圖書館所藏的五分之一，也趕不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一半。他們很知道家譜的重要性，所以不惜重價，在北京舊書市場上搶購，因此價格大增，我們自己反而買不到了。解放後北京圖書館大力收購，據初步估計合舊有與新收約有二千種左右，合之其他兄弟館及流散在國外的共計約五千種，除去重複約可得三千種。北京圖書館所藏除抄本、刻本、鉛印、

^⑤ Ball J. D. Things Chinese p.480

^⑥ Davis J. F. China 1857 Londo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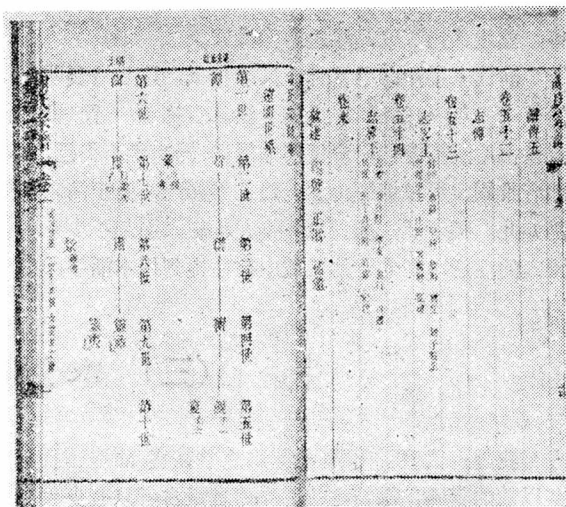


图四 《山阴潘昶莫氏家譜》嘉庆十三年（一八〇八）木活字印本

石印本外，木活字約占九百五十种，其中印于清代者約五百余种。清印本中未見順治本，康熙、雍正的有几种，乾隆、嘉庆各約二十种，道光、同治各約四、五十种，咸丰、宣統各約一二十种。光緒初年起虽已有采用鉛、石印刷家譜的，而为数頗少，清代木活字家譜十之六七是在光緒年間印行的，約有三百种。直至民国仍有三四百种是用木字排印的。清代家譜的姓氏超过了百家姓，約有二百多姓，其中最多的是張、王、李、陈、刘、吳等各姓，双姓或奇姓較少，又有少数兄弟民族如回族、滿族、和蒙古族，他們的家譜几乎都是写本或刻本。清代木字家譜分布在江、浙、皖、贛、湘、鄂、川、閩等省，北方各省譜牒既少，更未有用木字摆印的。

清代活字家譜以江浙两省占压倒多数，而两省中尤以旧浙江绍兴府江苏常州府为最多。这些地区多聚族而居，族权发达，几乎村村有祠堂，每姓有家譜。绍兴府八县中无县无譜，尤以山阴会稽（今绍兴）多至一百二十部，（图四）蕭山八十五部，余姚，上虞、嵊县、諸暨、各約二三十部，只有新昌較少。統計这一区域約近三百种，几占清代摆印本家譜的五分之三^⑦。绍兴一带有專門从事印譜的工人，俗称“譜匠”，或“譜师”，其中仅嵊县譜师盛时即多至一百余人。每当秋收后他們挑着字担，到绍兴或宁波一带乡鎮做譜。他們字担上的木字，或称木印，

只有二万多字，分大小两号，是用梨木雕成的宋体字。字盘用杉木盘，用竹片垫平，他們人数由五六人至十人，分刻字、图像、排印，分工合作，而以包头（經理）总其成。工作時間視族分大小，譜中資料多少而定，多則三月、半載，少則一、两月即可完功^⑧。绍兴附近的旧宁波府所屬如鄞县、慈溪、鎮海、奉化各县亦盛行譜牒，台州金华衢州所屬次之，而浙西 杭嘉湖又次之。江苏以常州、无錫一带



图五 《毘陵謝氏宗譜》光緒戊子（一八八八）木活字印本

⑦ 关于我国家譜，过去很少有人作过系統調查与著录。1960年（昭和三十五年）日本东洋文庫出版了多賀秋五郎的《宗譜の研究》資料篇一册，达八九〇面。著录的都是我国家譜，計日本东洋文庫藏八一六种，国会圖書館四三六种，日本公私所藏約共一六〇〇种，美国可倫比亚大学圖書館九二六种，北京圖書館藏三五三种，除去重复，共一二二八种。解放后北京圖書館新收約一千五百种，其中很多是日本美国所沒有的，因此宗譜之研究中各种統計数字，不够完全；然仍有参考价值。如木活字本共六一二种，內江苏二五九，浙江二二〇、安徽八三、江西二九、湖南、湖北各十、四川一。刻本三六三，鉛印九九，石印三八、写本一〇四、其他一二。又地域分布一二二八种中，分江苏四三三、浙江三七八、安徽一一八、江西四三、广东、山东各四〇、河北三四、湖南二〇、其余鄂、閩、辽、豫、川、桂、黔、滇各省均在十种上下。

⑧ 沈賢修先生訪問嵊县某老譜师語。

为最盛，清代家譜之冠以昆陵、晋陵、延陵、阳湖（均今常州）、武进、常州者約一百（图五）种。而以錫山、梁溪、金匱（均今无錫），无錫名者亦五十种。宜兴、江阴亦有数种。无錫、常州明代即以銅活字著名，常州又首創鉛字，在制造金屬活字方面有优良傳統。在清代常州家譜中也偶然发现有一种用銅活字印的咸丰八年（1858）九修《昆陵徐氏宗譜》，而十分之九仍是用木字。而且常州的排印工在清代最負盛名。包世臣說“常州活板字体差大，而工最整洁，始惟以供修譜，問及士人詩文小集，近且排《武备志》成巨观。而讲求字画，編摆行格，无不精密。又底刻而面写，檢校为易，以細土鋪平，版背折归皆便。”^⑨常州木字一头刻字，底面又写字，所以拣字归字比較容易，又用細土在字盘內鋪平，作为垫板之用，以此印工被称为“泥盘印工”。因为常州泥盘印工技术高明，所以安徽人將省立的出板机构官书局——曲水书局，設立在常州龙城书院先賢祠。^⑩甚至四川人有的把家譜稿本也寄到常州排印，而常州印工不到四十五天就把《泸州南門高氏族譜》印好。他們不但印家譜，更印其他书籍。如光緒初盛氏思补校印的明严衍《資治通鑑补》多至八十册，摆印精工，注文小字亦极清晰。常州附近的苏州府、鎮江府及其所屬各县也盛行家譜，而南京只有数种，江北一带更少。安徽則以旧徽州府績溪、歙、黟、休宁、祁門、婺源六县，及桐城为盛。安庆、宁国、池州、庐州四府偶有之。听说四川川北的印工也至省内各处摆印家譜，所带活字有木的，并有銅的，在缺少梨树枣木的地方，而所带之字又不够用，则临时用白善泥或黃泥做成小方块，刻字其上，用炭火烧成陶字，称为“燒料”，所以一部书可能同时采用金屬与非金屬活字。然而四川印的家譜却很少見，可能傳出省外的不多。此外江西、湖南、湖北、福建各有数种不等。

家譜同方志一样，也是一种連續性出版物，不过其間隔很长，有所謂“十五年一小修，三十年一大修”之說。古人称“三十年为一世”，故一般譜中多規定三十年須重修，否則謂之不孝。倘遇災歿或兵荒馬乱，也有过四、五十年才重修的。修譜需要一笔經費，或数百元以至数千元，往往由祠堂公款支出，或由派下子孙自由捐輸。又需相当物資，除

木字字盘等工具为譜匠所备外，临时往往又需添刻缺字，及封面、签条、序跋、图画、繪像，印刷时自然又需成批紙張、黑墨、或煤胶与櫻絲，裝訂又需簿面，或紙或布，絲綫、包角綢、夹板、布带，一应物料，相当可观。因此只有社会稳定，物資充足时，才有条件修譜，而修譜也成为合族的大事。新譜告成，举行祭譜仪式，有时演戏庆祝。重修时把一族中死亡出生人口，作一次总調查，登入新譜，新譜与老譜内容自然就有不同。所以不少的譜往往标明“重修”“三修”“四修”……有至“十四修”的以示与老譜有别。

家譜往往用紅綫来表示直系亲屬的世系，因此又可以說是朱墨套印本。其图像或木刻，或笔繪，又有五色彩画的，多出於民間画匠之手。他們根据祠堂或家藏影像画入，明清两代的画像比較可信。这些繪画不仅在艺术史上有价值，有时可补历史人物图像之缺，更可考当时男女服装制度。譜中印錯之字，多用木等盖去，再用紅色木字或黑字，印于其上，或四周，而原字仍隱然可見，間有附校勘記于譜末的。一般印数自七、八部至十数部，或二三十部，有多至四五十部甚至一百部的。每部編成字号，由各房珍藏。家譜除近代鉛印、石印本外，一般活字本多为洁白速史紙印，开本甚大，因为木字大，本子自然随之而大，普通多为高約三十公分左右，寬約二十公分左右。绍兴宁波一带的印本有高至四十六公分，寬至三十七公分半的。而康熙五十三年（1714）江西余干《黃埠徐氏宗譜》竟高至五十公分，寬至三十三公分，比一般印本寬大得多。册数少者四册、六册，普通多为一二十册，有多至四五十册者，故其分量亦相当重，不便携带。

中国做譜的風气也傳到朝鮮、越南、琉球。这三个国家現存的家譜各在二百种以上，^⑪越南琉球的譜牒多为抄本与少数刻本，而朝鮮二百九十二种譜中以印本为多，其中用木活字印的有三十三种。从他們的家譜中可以看出过去有不少中国人迁居到朝鮮、越南、琉球去。

⑨ 包氏《泥板試印初編》序

⑩ 刘声木《长楚斋随笔》卷七。

⑪ 同注⑦越南二二九种，琉球二〇六种。

(四) 印工与譜匠的生活

清代的木活字印工也很少把他們自己的姓名摆在书上。只知道雍正三年(1725)汪氏南陔草堂印宋《唐眉山集》书末有“湖城潘大有刊”字样。昆山陈景川在嘉庆間,摆印了陈元模所編的《淞南志》十六卷,在二續志末有“玉峰陈景川刻字局摆板”字样,这位陈景川当是刻字局的經理。同治十年(1871)福建宁化县印工阴維新摆印了李世熊的《錢神志》,自称“梓匠邑人阴維新”,虽然不是雕板,而仍称为“梓匠”。过了三年(1874)“寓江宁旌阳湯炳南鐫摆字印”元鮮于樞的《因学斋杂录》一册。所謂“旌阳”,即安徽旌德县之別称。湯炳南原籍旌德,寓居南京,不但雕板印书,也用活字印书,并且說鐫摆字印,可能自己刻字又兼摆字。其他姓名多不可考。《武英殿聚珍板丛书》有校对者姓名,无排字者姓名,而关于他們的生活却有間接的記載。武英殿摆字匠称“供事”,分“摆版供事”与“管韵供事”二类,初設十二名,后又添設額外供事十二名。在名額內的十二名的待遇“与匠役无异”,“亦照匠役之例,遇有摆板之日給与分例飯食,庶令常川供役,免致迟誤。”^⑫金簡原奏里所指的匠役系指“御书处”的刻字人、造墨人而言。他們的飯食是每分羊肉二两,老米九合,酱一两,清酱五錢,豆腐四两,豆芽菜二两,木柴一斤,炭一两。这是康熙二十九年(1690)設立御书处以来的老制度。乾隆三十三年(1768)豆腐、豆芽菜,改每分折銀三厘二毫九絲二忽,向广儲司支領,余物照旧行取。^⑬这些摆字人享受的官飯,每天可以吃到一些羊肉,清酱,不摆书的日期,他們的官飯也就停止。他們的工资未見記載,惟过去武英殿摆銅字人“每月每人工食銀三两五錢”,“刷印速四紙书一千篇,工价銀一錢六分,竹紙书一千,工价銀一錢二分。”^⑭他們的工价与此当不相上下。

清代江浙譜匠虽多,而有姓名可考的却少見。同治間无錫季子良在苏州排印《平江盛氏家乘稿》,光緒辛丑(1901)宋华堂与刘鉴亭刊印《庐江方何氏宗譜》。光緒二十一年(1895)木字本《山阴白洋朱氏宗譜》序文后,有“蠡城張廷相刻”六字,又譜中祖宗画像,均各有“順斋王銘画”,“張廷相鐫”两小方印。張廷相是一位担任刻画像的本地譜匠。所謂“蠡

城”,系指紹兴府城,紹兴城相傳为范蠡所筑,故有蠡城之称。譜匠虽为专业,而在农忙时一般也务农,或兼作其他手工业。他們挑着字担今年去此村,明年到那鎮,或到外县工作,富于流动性,好似十五世紀中叶欧洲早期的流动印工。有时过了二、三十年,那一族第二次重修时,岁数大的老譜匠可能又回到原地再工作。他們的工资有按月計的,清末民初大約每月十元。有按頁計的“每頁大洋二元”。又有所謂“板价”,以字盘計,光緒間“每盘計錢九十二文”,这可能是收回活字工具的折旧費。一般的修譜都管飯食,并供应茶叶、茶水、烟、火紙、油等生活資料,在开工或完工时,往往請他們吃酒席。印工除工資外,又有所謂“賞錢”或“花紅”等名称。譜匠亦須学徒三年,要具有相当文化程度,往往以“童生”为之。头两年老师傅不肯好好教,多为师傅家当杂差,学习雕宋字等业务,全賴自己用心,晚間自学,三年学滿,即成为正式譜匠矣。^⑮

⑫ 同注②“再查御书处現行之例,凡做墨刻字人等服役之日,俱給与分例飯食,今排印聚珍板处亦照此办理”。

⑬ 《欽定大清会典事例》卷一一九九,御书处四作。案御书处在西华門內南,共房四十三楹,康熙二十九年立,初名“文书館”,后改今名,刻御制詩文法帖之屬。見欽定日下旧聞考卷七十一。

⑭ 同注③武英殿庫作匠役。

⑮ 宣統三年《丹徒姚氏五修族譜》八册(一百部)“一支排印工价,每頁大洋二元,計印正譜八百二十九頁,抽換十八頁,鼠伤复印九頁,总共八百五十六頁,共大洋一百七十一元二角。一支排印譜五个月校对飯食,并誊稿,书工飯食,排印飯食,僕人工飯茶費等,共大洋三百三十四元四角。”光緒二十二年常州排印四川《涪州南門高氏族譜》刷印族譜工費,內开“一聚珍板集印族譜一百部,每部計六卷,分裝四本,其板价每盘計錢九十二文,共三百十二盘,合錢二十八千七百另四文。一印工加賞錢二十三千二百三十二文。”同治甲戌吳中十賢祠刊印《平江盛氏家乘稿》十六册,卷末附征信录:摆印譜頁一千四百三十頁,刻像贊祠墓十九頁,刻世系图二十二頁,刻匠茶叶、烟、油、茶水火紙、信力等項,金鑑手付共計錢三十七千五百七十六文”。又同注②。